

社會主義的當代意涵^{*}

許國賢^{**}

一、前言

二、資本主義與經濟不平等

三、個人與群體：以失業問題為切入點

四、結語

社會主義最初是以資本主義的反命題而出現的，但隨後亦逐漸在反命題的基礎上發展出其正面的學說和主張。社會主義要求建立一種更具有群體意識和合作精神的人類結合關係，並認為更實質的平等才真正有助於體現絕大多數人的自由。激進的社會主義實踐運動在二十世紀的頓挫已然十分明顯，但倘若能對社會主義的核心要素進行審慎省察，仍可從中汲取有助於思索及改善當前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之內在難題的積極成分。本文將分別從嚴重的經濟不平等之紓解，以及個人與群體之關係的改善等兩個角度，探討社會主義思潮所能給予的積極啟示。

關鍵詞：社會主義、不平等、福利國家、失業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深刻批評，並感謝國科會補助本研究（NSC 96-2414-H-305-013）。

**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E-mail: gossens@mail.ntpu.edu.tw

投稿日期：二〇〇九年三月九日；接受刊登日期：二〇〇九年三月廿三日。

東吳政治學報/2009/第二十七卷第一期/頁 123-154。

一、前言

自從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末葉蘇聯解體，進而牽動東歐的政治構圖產生巨大變動之後，社會主義在現實政治的競爭力和吸引力已明顯削弱。但即使是一個在現階段相對處於退潮態勢的運動，倘若對其核心關懷進行審慎省察，仍可從中汲取有助於思索及改善當前主流政經體制底下的群體生活樣態的積極成分。尤其，在冷戰時代的對抗激情褪去之後，更能較冷靜地進行此種省察與思索。

社會主義思潮起源於對於歐洲工業化所造成之後果的疑慮和不滿，繼而發展成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批判，並以對於所有權的通盤檢討以及相應的分配正義之訴求做為其矯治的核心主張。因此，社會主義最初係以經濟面向的一個反命題（antithesis）而出現，並逐漸在反命題的基礎上積累沈澱，進而發展出具有一定的目標導向的正面主張。如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剴切指出的，社會主義同時擁有一種經驗理論和一種道德學說（Crick, 1987: 79）。此一經驗理論即是對於資本主義整體運作邏輯的深刻解析；此一道德學說則較為複雜，並且也存在著一定的內部歧異，大體而言，其主要內涵是要求建立一種更具有群體意識和合作精神的人類結合關係，並認為只有體現更實質的平等才真正有助於促進絕大多數人的自由，以及落實博愛的情操。而此種理想的實現，則必須以生產關係的重組為前件。

二十世紀的既存社會主義（existing socialism）從其慘烈的鬥爭過程到備受爭議的執政經驗，都深深影響了現代史的進程。政治理論自然不能無視於二十世紀既存社會主義的實際歷史，相反地，對

於此一實際歷史的檢討，除了得以總結既存社會主義的得失，亦提供了機會讓我們去注意一些更一般性的政治原則。要言之，二十世紀既存社會主義的經驗至少提醒了我們，不會犯錯的權威（infallible authority）這一類的驕傲的假設，往往會帶來不可彌補的禍害。而向不會犯錯的權威俯首稱臣的社會，則會使個人自由與權利陷入極其危夷的處境。值得注意的是，當代民主過程中不時出現的民粹風潮，固然在本質上並不完全相同，但其之朝不會犯錯的權威傾斜的趨向，亦不能不予提防。其次，既存社會主義為了矯正經濟權力的集中化，而遂以政治權力的集中化為其因應手段，其結果是為了馴服一巨獸（Behemoth）而創造了另一難以馴服的巨獸。但倘若柏拉圖美麗城邦（Kallipolis）裡的善意的、恆常只顧慮整體利益，並且通曉包括善的形式在內的一切真理的哲君，並非人類所能奢望（事實上，晚年的柏拉圖即有此感喟），那麼，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化就是嚴重的問題。無論如何，嚴肅面對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是使政治理論透過省察現實以保有指引未來之能力的重要途徑。因此，從政治理論的角度梳理社會主義的正面及負面意義，亦即，盤點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中的已然死滅的部分以及仍具有積極啟發性的部分，應是具有一定意義的。本文的探討將集中在下列兩項主題：第一，分析社會主義思潮對於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嚴重的經濟不平等所能給予的改善的參考；第二，在當代的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上，社會主義究竟能給予何種啟示。

二、資本主義與經濟不平等

社會主義起源於對資本主義的質疑與不滿，資本主義所造成的

不平等及其後續效果，促使社會主義者希望透過有助於落實更實質的平等的改革，來修正或取代資本主義。因此，平等的訴求可謂是與此種質疑與不滿緊密相繫的，如洛爾默（John Roemer）所強調的，社會主義所期盼建立的乃是奠基在平等規範而非貪婪規範的社會（Roemer, 1994: 25）。但社會主義所要求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平等，則值得深入探討。

對社會主義者來說，無論資本主義在生產力上取得多麼空前的進展，資本主義始終無法提供「一種使所有的人在物質上安穩以及在道德上有尊嚴的生活（Miliband, 1994: 13）。」資本主義雖然是一部促進經濟成長的強而有力的機器，但在本質上卻是一部對不同的成員明顯具有不均等傾斜效果的機器。在資本主義體制底下，只能靠出售勞動力來維生的人和有能力購買他人的勞動力的人，在若干關鍵面向上各自有著極不相同的命運和可能性。是否擁有生產資料（生產工具）這個面向上的不平等，在商品生產與資本的累積及再生產的過程中，不斷產生許多讓人道主義者不忍卒睹的不平等。當一個經濟體制結構性地使一小部分人的財富和享受建築在多數人的物質不安穩之上，就很難不出現不平之鳴。

做為資本主義運動邏輯的無與倫比的解析者，馬克思確實預見了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的核心趨勢，「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恆久趨勢和發展規律，乃是使生產資料越來越和勞動分離，以及使分散的生產資料越來越大量地聚積在一起，也就是使勞動轉化成雇傭勞動，使生產資料轉化成資本（Marx, 1981: 1025）。」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裡，儘管資本家以外的一般大眾，若開源節流有成，亦能累積小額之資本。但這類小額資本多半只是做為家戶的生活儲備，而未投入商品生產過程，故而實際上只是名義上的資本。

再者，即使部分這類資本為了投資理財而進入金融市場，其結局往往只是載浮載沉於盈虧難料的急遽波動之中，殊難成為影響市場的重要力量。雇傭勞動（工資勞動）和資本的兩極化原本就是資本主義的內在趨勢，而全球化則更有效地解除了約束資本運動的諸種障礙與桎梏，從而一方面擴大了雇傭勞動（工資勞動）在世界範圍的普遍化，另一方面則使工資勞動者處於更易受到國際因素的即時覆蓋的艱危處境。在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景氣循環中，景氣擴張階段給予工資勞動者的利益相較於資本家而言可謂萬不及一，但在景氣緊縮階段，工資勞動者則明顯暴露在風暴的打擊之下，以致基本的生存及溫飽問題遂成了各國政府迄今仍難以有效因應之難題。

自從馬克思論證了私有財產、異化勞動、剝削在資本主義體制裡的內在鏈結之後，廢除私有財產遂成了激進社會主義運動的核心綱領，「共產革命就是和傳統的財產關係的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自身的發展即隱含了和傳統觀念的最徹底的決裂」（Marx and Engels, 1967: 103-104），因此，「共產黨人的理論可歸結為一句話：廢除私有財產（Marx and Engels, 1967: 96）。」或者，如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人道主義的哲學語言所強調的，「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做為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是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向其自身做為一個社會存在，亦即做為一個人的完全復歸，……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Marx, 1975: 348）。」但我們必須說，歷史之謎似乎是不輕易顯示最終解答的，二十世紀的幾次廢除私有財產的驚天動地的大規模實驗，或許局部完成了人做為一個人的復歸，不過，它的負面效果也許比它的建樹還更為駭人！總的來說，二十世紀的廢除私有財產的大規模實驗，至少在下列幾方

面是極值得商榷的：第一，廢除私有財產意味著大幅否定個人為自己決策，以及為自己的決策負責的空間，但這種弱化個人自主性和限縮個人自由的舉措，顯然是過於昂貴的代價。第二，廢除私有財產之後所採行的全盤性計畫，在理論上似乎假定了一種足以洞悉整體社會需要和資源配置的全知全能的理性，然而，這樣的假設一方面過於冒險，另一方面則往往被實際進程和發展所否定；¹再者，全盤性計畫在控管過程中所引起的無效率及浪費的問題，亦是不容小覷的難題。第三，這類大規模的實驗使個人淪為政治上的脆弱的存在，而倘若該社會原本就欠缺民主和保障個人權利的傳統，則這些脆弱的個人不僅無法為自己的需要發聲，此外，對於影響所有的人的全盤性計畫亦無置喙之餘地。

因此，即使若干激進的社會主義流派仍堅持廢除私有財產的必要性，但更合理的思考方向應該是：源自於私有財產的諸種不平等應該如何朝更具啟發性的方向來被調解及矯正。這也是本文的基本立場。準此以論，我們必須說馬克思是資本主義病症的一流的診斷者，但他針對其病症所開具的處方則未必合宜。如果任何的政治理想都必須通過實踐的檢驗，那麼，我們就不能不盱衡我們這個時代的實況和教訓，從而另闢蹊徑來考察實現特定的政治理想的可能性。賢恩（Amartya Sen）曾謂：「儘管特定的社會主義的治療之方已因實際上的失敗而失去信譽，但社會主義扣緊資本主義裡的不均

1. 如啟蒙時代法國著名的保守主義者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所說的，「但我們是什麼，我們只是脆弱而盲目的人類！我們稱為理性的那個閃爍的光芒又是什麼？當我們計算了所有的可能性，質疑了歷史，滿足了每一種懷疑和特殊利益，我們仍然只能擁有虛幻的影子，而不可能擁有真理（Maistre, 1994: 76）。」而這種對於人類理性能力的質疑，也被當代的海耶克（F. A. Hayek）等人所繼承，從而構成了保守主義者批判大規模的全盤式計畫的重要基礎。

衡所進行的批判，仍然是饒富意義的。尋求嶄新的制度解答的重要性固然無庸置疑，而如何因應不平等和剝奪的迫切性更是與日俱增（Sen, 1996: 35）。」的確，在資本主義的思想框架裡，固然可以對資本主義已然呈現的內在難題尋求一定的彌補之道，但問題的更深刻的暴露與涵蓋面更大的解決問題的思考，恐仍須借助來自於社會主義的批判。

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平等可謂包括了兩個不同的層次，亦即物質層次和精神層次。而精神層次的平等（例如尊嚴的平等、共同做為社群一份子的成員身分的平等）又必須以物質層次的平等為前提。故而我們的討論主要將集中在做為前提的物質層次的平等。

有些立場保守的論者認為，平等的訴求總是和嫉妒心理有關，而期望在某個面向追求及實現平等所提出的論證，又往往在有關聯的參照準據和無關聯的參照準據之間徘徊遊走，因此，「平等這個字在政治裡乃是一個危險的字眼（Lucas, 1966: 244）。」這樣的論點可謂很好地反映了對平等訴求抱持敵意或戒心的人們的一般心理。² 即使我們暫且承認平等的訴求或許包含了為何他人有之而我獨無的嫉妒心理，但必須注意的是，害怕特定的平等訴求真的被實現的人，亦存在著某種特殊心理。例如，當面對特定的平等的訴求時，因為該平等訴求的實現而可能損及其既得利益的一方（例如封建社會裡的貴族階級在面對垂直社會流動的機會平等之要求時），或多或少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失落感。而這種失落感係源自於曾經擁有之物的即將被剝奪而產生的喟歎、感傷乃至於憎恨。換句話說，

2. 某位保守主義者就曾謂：「平等是一種神祕的、不理性的野心。在這個面向或那個面向來護衛平等是可能的，但如果被提高為一種絕對的價值，則平等的理念就是空洞的、不吸引人的（Scruton, 1991: 24）。」這也充分反映了保守派對於平等訴求的警戒與疑慮。

平等的訴求本身確實像是情緒的蹺蹺板，擁護的一方和反對的一方各自都易於被激起某種負面的情感，而非僅僅只是擁護的一方才如此。更進一步來說，某些平等的訴求或者對於特定的不平等的不滿，其所牽涉的情感毋寧說是一種義憤（moral rage），亦即一種基於特定的正義觀所產生的道德憤怒，應該說對於資本主義裡的經濟不平等的不滿，即屬此類。

做為資本主義的反命題，社會主義批判的主要目標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經濟不平等，以及此一不平等對於多數人的生存與尊嚴所構成的嚴重威脅。而在繼續討論之前，必須先行指出的是，具有說服力的社會主義的平等訴求，並不指向等同齊一的平等，並不是要剷平一切的經濟不平等。無論如何，如果因為追求平等以至於不能容許任何的不平等，無疑將是偏激而可怖的，誠如聶格爾（Thomas Nagel）所說的：「如果只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享擁高檔美食、高級時裝和精美宅邸，而就允許任其不復存在，我認為這樣的平等主義就是不對的（Nagel, 1991: 138）。」事實上，二十世紀的幾次社會主義的大規模實驗，確曾走上齊頭式平等的極端道路，並釀成令人髮指的慘禍。這一段血淚交織的歷史不僅是社會主義不能遺忘的一課，也是任何企圖改良人類群體生活的構想不能不從中汲取教訓的一課。³ 齊頭式的平等的根本問題在於剝奪了自由與多樣性的空間，而任何使自由不再有實質意義的平等訴求，都是難以服人的。要之，自由與平等彼此之間同時兼有相輔相成以及相生相剋的關係，缺乏了一定的平等，則自由將流於空泛的口號，相反地，不容

3.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一位活躍的美國社會主義者因而感慨道：「共產國家的興起...比起歷史上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扭曲及混淆了社會主義的意義」，「由全然不是社會主義式的社會來向眾人定義何謂社會主義，實在是不可容忍的諷刺。這是一項必須被拆解的諷刺（Harrington, 1990: 67）。」

許差異空間的平等則無異於扼殺了自由的可能性。亦即，在自由與平等的槓桿上，朝任何一端的極端式傾斜，都將導致悲慘之後果。

資本主義裡的經濟不平等源自於商品生產過程中對於剩餘價值的剝削，商品生產是為了資本的累積與再生產（更簡單地說，是為了利潤的創造），而資本的累積與再生產可謂是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此一內在動力不斷推進資本主義的生命循環，並且生猛地複製及鞏固了它的生存所依賴的生產關係。以商品生產為核心，一方面延伸到商品生產的前置作業（例如商品的研究開發與設計、生產基地的布建、原料的取得等等），另一方面亦延伸到商品生產完成之後的後續作業（例如市場的開拓、通路的建立、廣告行銷的展開、實際的銷售行為、售後服務、後續使用費用的徵收等等），這整個循環過程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及生存手段，的確養活了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大多數的人口，從而使資本主義時代成為地球人口總數量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時代。但必須進一步追問的是，多數人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活著。顯而易見，多數人只能以出售自己的勞動力（亦即，出售自己的從事增加價值的有用的工作的能力，參與商品的生產及協助資本家進行資本的累積），以做為一個工資勞動者的身分而活著。這種對於多數人的角色的結構限制，使得資本主義本身就必然是一個造成經濟資源不平等分配的體制。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也意味著資本主義運動速度進入了變頻加快的新階段，其直接結果就是貧富的兩極化或 M 型化的加速確立。少數富有者的單筆奢華消費即抵得上一般工資勞動者整個家庭的一年或數年的生活所需，而在資本主義周期性地因為生產過剩及消費不足而陷入蕭條階段時，不可勝數的工資勞動者又將面對失業對家庭生計所造成的殘酷衝擊，以致連其存活的基本權利（更遑論有尊嚴地活著）皆岌岌

可危。這種形勢的普遍化就更容易引起人們對於資本主義的人道內涵的質疑。

貧富的兩極化是政治社會穩定的一大威脅，這是早在亞里斯多德的時代就已經被證實的觀察。而政治社會動盪無疑就是資本累積運動的障礙，面對此一嚴峻的威脅，資本主義當然也相應地發展出因應的改革手段。我們特別要加以討論的則是分散股權和福利國家這兩項別具意義的改革手段，因為它們代表了試圖減緩不平等的自覺。首先，就分散股權來說，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成熟化及精緻化，除了以物質誘因不斷激發科技的創新，並使科技創新應用於商品的革新與改良，進而造就了驚人的消費選擇與可能性。若干產業部門或基於爭取尖端人才的需要，或純粹出於企業主的善心，亦開始採行員工分紅配股制度。這樣的制度雖然經常引起外資法人和散戶股東的質疑（其理由不外乎此一制度侵蝕了市場上的股東的合法權益，並使特定公司的每股盈餘數字成為虛胖的數字），但它在本質上確實是一項資方向勞方讓渡其剩餘價值的進步之舉，因而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如果是出於企業主的善心，那就更為可貴了，因為苛刻的、在購買了勞動力之後就力圖榨取殆盡的企業主形象，在絕大部分地區依舊是殘酷的事實。不過，截至目前員工分紅配股制度僅在極少數的產業部門得到落實（主要是在研究發展占工作比重較高的資訊科技產業），而迄未成為跨產業的普遍現象。分散股權的另一個表現面，則是上市公司藉由資本市場而使一般公眾亦得以購買及持有股份，從而享有分配經營利益之資格。相較於僅僅是由單一或合夥的企業主全盤掌握股權的情況來說，這當然有效地使利潤的分派在涵蓋的對象上明顯擴大，同時也使企業主必須對更多的公眾（亦即股份持有人）負責。然而，在實際的運作上，隨著全球化

時代的金融資本在世界範圍的縱橫馳騁，再加上其在投資之名底下所展開的投機冒進以及對於弱勢競爭者的無情坑殺，使得透過資本市場分散股權的良好用意終究大打折扣。⁴ 金融資本的成型確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重大階段，希爾弗丁（Rudolf Hilferding）曾謂：「金融資本意味著資本的統一化，先前各自離立的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等領域，現在則被歸併於產業鉅子和銀行主人透過緊密的個人結合而形成的金融祭司的共同統領之下。這種結合的基礎在於以大型的壟斷聯合體來消滅個別資本家之間的自由競爭（Hilferding, 1981: 301）。」即使希爾弗丁對於金融掌控者的全面能力或略有高估之嫌，但金融資本之對資本主義的運轉速率產生深遠影響則為不爭之事實。不同於產業資本的是，金融資本所遂行的直接以錢滾錢的擴張，一方面使股權本身成為一種複雜的金融遊戲的籌碼，而包括連動債（SN）、擔保債權憑證（CDO）、信用違約交換（CDS）、期貨在內的各種巧妙包裝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則在貪婪所築起的豪賭大夢中助長了資金的投機化和荒謬化，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分散股權的理想面和現實面之間的巨大落差。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是福利國家這項改革手段。對於那些強烈信奉市場機制因而反對福利國家政策的人來說，社會福利措施不僅意味著對於個人的經濟自由的剝奪，也會對追求利潤與財富的熱情產生抑制作用，艾克頓（H. B. Acton）即謂：「福利分配越是傾向於平等，就更不容易產生得以創造財富的競爭性經濟活動的熱情。在競爭式資本主義體制裡，個人被認為必須『為了他自己』而竭盡

4. 美國在二〇〇八年的一連串金融事件，從次級房貸風暴、二房危機，到雷曼兄弟等投資機構的相繼倒閉，在在顯示了金融資本的冒進性格，以及其對全球金融秩序可能造成的嚴重危害。

所能，這一般也意味著為他的家人和任何他所嚮往的理由而竭盡所能。但如果一個人不能為了他所需要的東西而去使用他的所得或利潤，如果一個人被迫將自己的子女送往他不喜歡的學校，或被迫去就診於他不信任的醫生，那麼，他勢必會懷疑自己的營生活動是否值得（Acton, 1993: 88）。」而立場更極端者則甚至認為，社會福利的相關政策在本質上乃是要求那些經濟能力較強的人，為了那些必須接受濟助者而使自己每天的工時中的一部分，成了非自願的強迫勞動，從而使得那些接受濟助者成為些經濟能力較強者的局部的所有權人（Nozick, 1974: 172）。此外，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則猛烈批評，社會福利的諸項細部政策整體而言只是以極大的代價（最主要的是犧牲了個人的選擇的自由）來換取極小的、乃至於不成比例的好處。他批評強制性的老人年金或養老金保險只是為了百分之一的人在老年時可能對社會造成的負擔而犧牲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自由（Friedman, 1982: 188）。此外，實施最低工資法之後，由於企業主會採行節約成本的應對措施，因此在最終只會使失業情況更形嚴重，「如果最低工資法有任何效果的話，其效果就是明顯地助長貧窮（Friedman, 1982: 180）。」但傅利曼在這方面的意見仍有諸多可議之處。第一，在人類群體生活中，規範（nomos）的存在就意味著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自由，傅利曼等人所期盼的幾近百分之百的經濟自由亦不能例外。第二，傅利曼等人只看到了完全不受限制的經濟自由在資本主義架構裡的有效率的一面（通常也是有助於財富之積累的一面），而卻不太在意人道的一面、無關效率的一面，這種選擇性的忽略只會使其學說成為物的科學，而非人與物的相互關係的科學。第三，如果只是以資本主義的繁榮期來估算市場競爭的失敗者和弱勢者的處境（而傅利曼等人正有這樣的傾向），將是

十分危險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繁榮期和蕭條期總是交替出現的。第四，在經濟面向上或生存的面向上，當一小部分人的自由是建築在相當部分人的不自由或無法有意義地行使自由的基礎上時，此種自由亦難以可長可久。無論如何，雖然上述的反對福利國家的意見在今天並未全然銷聲匿跡，但不同程度的福利國家政策則已成為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的一部分。

事實上，福利國家政策之出現乃是資本主義救亡圖存的體制內手段。不仰賴福利國家政策來改善市場競爭的失敗者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則資本主義就會在自己的體制裡不斷製造質疑及顛覆體制的力量，並且使得勞動力的供給出現素質和徵引來源的危機。就資本主義本身來說，福利國家是做為一種必要的善來局部抵消市場競爭所可能產生的惡。此一必要的善防止了資本主義的惡質傾向的全面暴露，並以做為防護網的功能守護了市場競爭的失敗者的繼續向下墜落。因此，福利國家可以說是對於資本主義運動邏輯所隱含的非道德性的局部救贖。海爾布洛納（Robert Heilbroner）曾指出，「資本的行進線路（the circuit of capital）並不具有內在的道德面向」（Heilbroner, 1985: 140），福利國家的出現當然不可能因而就使資本主義成為一種具有正面道德內容的經濟體制，也不可能因而根本性地改變資本主義裡的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但它對於防止不平等的過度極端化，確實有其不容輕忽之作用。

當然，對於激進的社會主義者而言，福利國家絕不足以做為改造的終點，而頂多只能算是一種階段性的緩衝機制。不過，從較溫和的社會主義的立場來看，福利國家可謂是具有歷史標竿意義的重要進程。而就其對於經濟資源之不平等分配的緩解來說，則有必要進一步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福利國家，亦即「保險性質的福利國家」

和「共享性質的福利國家」。保險性質的福利國家當然也包含了來自於政府稅收的對於弱勢者的補貼，但其基本精神則在於要求國民必須在勞動能力較好的階段即透過強制保險來為可能的不幸和未來的需要預作準備。⁵ 共享性質的福利國家可以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為代表，強調政府、資方、勞方的共同協商與市場機制的並存，並透過高稅率來對全體國民大規模地提供各種共同必需品及補貼。無疑地，共享性質的福利國家（亦即從子宮到墳墓）必須全面地仰賴較高之稅率，以一九八〇年代中葉的瑞典來說，中等收入的職工其邊際稅率（亦即課稅淨值中最後一塊錢所課徵之稅率）就已達百分之六十，經理階層的邊際稅率更高達百分之八十（Newman, 2005: 56）。⁶ 從比較的角度來說，保險性質的福利國家更像是試圖以較小的代價來維護市場經濟的主要面貌，而共享性質的福利國家則更像是試圖以對於市場經濟的最大的容忍來向社會主義進行和平過渡。我們認為，如果廢除私有財產已經是不合時宜的方案，那麼，共享性質的福利國家所具有的實驗意義就不容低估。雖然我們並不認為不同文化傳統的民族都能共同適用單一一種變革方案，但斯堪地那維亞式的共享性質的福利國家提醒我們思考的是，某方面的經濟自由的受到限制（這當然指的是每一個人支配其私有財產的絕對自由），是否必然會使其人生頓失意義？如果並不必然如此，而且在此一過程中還能更好地呈現共同體的可能性，那麼，斯堪地那維亞式福利

5. 一般而言，保險性質的福利國家並未在富人與窮人之間進行大規模的資源重分配的流動，因此並未對富人採取極高之稅率。現今之台灣無疑即屬於保險性質的福利國家。

6. 顯而易見，對於那些更期盼能自行支配自己辛苦掙來的每一塊錢的人來說，瑞典的極高的邊際稅率就令人難以忍受了。無怪乎原籍瑞典的男子網球前世界球王柏格(Björn Borg)會選擇移居他國。但在另一方面來說，如此高的邊際稅率並不妨礙宜家(Ikea)等跨國大企業的存在。

國家的後續演變，就極值得關注了。

要言之，在上述的資本主義因應貧富兩極化的改革手段中（亦即分散股權和福利國家），似乎福利國家這項手段是具有更深刻之意義的，而共享性質的福利國家又明顯比保險性質的福利國家更具有改善貧富兩極化的雄心。近年來，亦有若干社會主義者熱中倡導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暫且不論這類個別主張的細部差異，其核心內容大體上乃是在保留自由市場之價格機制的前提下，透過以民主方式決定的經濟計畫來節制市場力量，同時讓工資勞動者分享其所任職之企業的股權，並對某些關鍵企業實施公有化的社會主義模式（Roemer, 1994; Nove, 1989; Miliband, 1994: ch. 4）。市場社會主義所欲凸顯的是，市場機制可以和社會主義所宣示的價值和理想並行不悖，但委實言之，我們仍難以研判這類市場社會主義的構想的在現實上的可行性，因為即使經常被提及的狄托（Josip Tito）時代的南斯拉夫體制也仍然和上述構想有著一定的差距。再者，如何讓企業主願意讓渡股權予其職工，如何以民主的方式決定可與市場機制共存的經濟計畫等等，皆為牽涉甚廣之事。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完全揚棄市場（亦即極度限制個人的選擇的自由）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具有說服力的。然而，無論是共享性質的福利國家或市場社會主義的構想，都共同表明了對於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和貧富兩極化的深刻關切，而這正是社會主義一貫的關懷之所在。如果不是因為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就不會有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資本主義的最大弱點就是它所造成的嚴重的經濟不平等，而此種嚴重的不平等又使得資本主義所許諾的可能性對許多人而言只是形同泡影。

準此以論，我們或可將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平等之特徵歸結如

下。第一，社會主義所召喚的並不是完全沒別差別的經濟平等，而是試圖以更實質的經濟平等（亦即提升弱勢者的經濟處境）來紓緩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從而改善此一不平等所導致的多數人的生活機會的空洞化。誠如貝克（John Baker）所指出的，「平等本身並不是一項目的，平等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平等對於人們的生活所產生的作用（Baker, 1987: 151）。」的確，對社會主義來說，更實質的平等只是一項重要的手段，其目的在於提醒人們正視嚴重的經濟不平等並思所改善。第二，社會主義對於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的質疑與挑戰，所試圖喚醒的是對於人類的經濟活動的通盤省思，挑明地說，即使商品生產仍將是可預見的未來裡的經濟活動的主軸，但我們必須嚴肅思考的是，哪些生活面向是不宜被商品化的？哪些領域是不應全然服膺利潤法則的？資本的哪些運動方式是欠缺積極性從而是應該被檢討的？或者說，「如何使生產係臣服於資本的利潤需求的經濟得以被生產係臣服於需要的經濟所取代（Gorz, 1982: 122）。」事實上，只要為了利潤而生產仍然是經濟活動的主要驅動力，就不可能停止資源的開採與搜括，亦不能停止對於地球生態的破壞。因此，對於上述問題的思考既是改善貧富兩極化之所必須，亦是使資本主義逐漸產生良性質變之所必須。第三，就長程的理想來說，社會主義的平等觀是和某種勞動的哲學相連繫的。在商品生產的體制下，勞動對應著一種由市場決定的價格，勞動被轉化成工資勞動，從而一方面成為商品生命循環的一個必要環節，另一方面則是造成貧富兩極化的直接原因。但人們在進行為資本家的利潤目標而服務的工資勞動時（亦即，外在強制加諸的勞動），在多數的情況下可謂很難從勞動中獲得自主的滿足感，這種勞動和勞動者自身的割裂使得人們只能在工資勞動以外的自由時間尋求自主的可能性。當

然，資本主義對此並不是毫無反應的，它的主要回應就是縮短工時。我們承認，縮短工時無疑是現有體制下的一大進展，然而，更宏大的長遠方向則是去探索如何更多地讓勞動擺脫商品化的邏輯，並成為體現一個人的內在創造潛能的外在憑藉。後面這項目標當然是極其遙遠的，但它涉及的乃是更人道的經濟生活的可能性。再者，從較淺顯的角度來說，資本主義底下的所得分配曲線明顯過於陡峭，某些經營無方以致公司破產倒閉的首席執行官仍能坐擁折合數億新台幣的年收入，此一數額已遠勝於多數工資勞動者終其一生的總所得，其之不合情理當是顯而易見。辯護者固可辯稱某一項工作究竟應值幾多報酬，係由市場機制所決定，但問題即在於市場背後常有既得利益之隱藏之手操弄其間，從而使勞動力之價格機制徒有自由之名。故如何使所得分配曲線更趨平緩，俾使等量之資源得以為多人所分享，亦是社會主義所標舉之方向。

無論如何，社會主義的當代意義之一，就是敦促人們正視資本主義體制底下的嚴重的經濟不平等，進而以此為出發點，去探尋使資本主義不致成為無法駕馭之巨獸的排解之道。一個人們進場時的先天條件即明顯決定了其可能的作為的市場機制，是難以在道德上說服人的。波比歐（Norberto Bobbio）曾謂，人既平等而又不平等，端賴用以評量的基準而定，這是平等主義者和反平等主義者都不否認的。只不過平等主義者相信人與人的相同之處在形塑更良善的社群時有著更大的重要性，而反平等主義者則更相信人與人的相異之處的重要性（Bobbio, 1996: 66-67）。的確，這是一場長程的歷史拉鋸，而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雙方的論據的力道又會互有消長。然而，只要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嚴重的經濟不平等未獲得有效的改善，從而使多數人的生活機會面臨非自身因素的箝制，則平等主義的訴

求就一直會是更具有道德理據的聲音。

三、個人與群體：以失業問題為切入點

不同的政治意識型態的重要歧異之一，就是其對於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所抱持的理解。此一歧異一方面標示了特定政治意識型態的基本特質，另一方面則規約了它的細部主張。在本節裡，我們將以失業問題為例，來對比社會主義以及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capitalism/liberal democracy complex），在面對個人與群體之關係時的可能的差異。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只有在歷史時序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之後，失業才開始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失業意味著脫離商品生產的循環鎖鏈，意味著勞動力處於無買主的狀態，而對工資勞動者來說，這也代表了他唯一的維生手段的被剝奪。倘若失業者亦是一家家計的承擔者，且亦無相當之積蓄，則其影響自是更形巨大。而即使在最富裕的歐美工業發達國家，長期結構性失業早已是揮之不去的夢魘，在一九九〇年代西歐主要國家的失業率經常在 10% 以上，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二〇〇三年法國和德國的失業率仍達 9.3%，義大利為 8.8%，加拿大為 6.9%，英國為 6.0%，美國則為 5.0%（Wright, 2004: 509）。而在二〇〇八年歐美金融大海嘯進而引發新一波的全球性經濟蕭條之後，失業率數字在未來之再度惡化已是在所難免。但各國官方的相關統計數字只反映了問題的一面，有論者更指出，加拿大的處於不安定就業狀態者（亦即臨時工及短期合約工）加上失業者就可能達 40%，而在美國除了失業者之外至少就有 20% 至 30% 的人係處於上述的不安定就業狀態（Wood, 1995:

285-286)。⁷

面對失業問題，社會福利制度較上軌道的國家皆會透過失業保險或失業救濟而給予失業者所得補助，從而局部地彌補其所得的缺口。但如賢恩（Amartya Sen）所正確地指出的，如果失業所涉及的僅僅只是所得的損失，那麼仰賴社會福利制度的所得補助即可相當程度地排解問題，不過，失業事實上還對失業者造成了其他深遠的負面影響，例如「心理傷害、喪失工作動機、技能和自信、病痛和罹病情況甚至死亡率之增加、家庭關係及社會生活的裂解、社會排斥的惡化，以及族群緊張和性別不對等的加劇等等（Sen, 1999: 94）」。⁷失業固然不是造成貧窮的唯一原因，但其之做為主要原因當無疑義。而人們在面對貧窮現象時，往往只以所得的偏低視之，但貧窮現象一直受到忽略的另一個面向就是，貧窮也意味著能力的剝奪（capability deprivation），因此，失業做為貧窮的重要肇因，無疑也隱含著失業者的能力的剝奪的危險（Sen, 1999: 87ff）。而一個人的選擇及實現自己期望之生活的能力如果日趨弱化，當然是一個危險的訊號。

如前所述，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失業者係勞動力處於無買主狀態的人，但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絕大多數人只能透過出售其勞動力來維持生存，因此，失業即意味著其唯一的維生手段的被剝奪。近年來，隨著經濟形勢的持續低迷，在台灣及日本即有不少已有家眷的失業

7. 值得注意的是，領時薪的臨時工及短期合約工除了處於得以被任意解除聘任的處境外，亦被資方用來宣示只有進行實質勞動的工時（time actually worked）才足以使一個人有資格領取報酬，從而成為資方反對縮短工時的論據之一。但越來越多的工作職務（例如維護系統的技術人員、醫護人員、處理緊急及意外狀況的人員）則證明了他們之所以有資格受薪，是由於他們在必要時刻的可供仰賴的介入能力，而不是他們的實質勞動工時（Gorz, 1994: 91）。然而，截至目前，處於不安定就業狀態者（亦即臨時工及短期合約工）卻仍明顯受到實質勞動工時的範限。

白領職工，每日仍一如往常出門上班，但實則棲身於公園或廉價咖啡店，此種偽裝式上班著實反映了失業者的難以言說的心理壓力與悲涼。而無論是否藉著偽裝式上班來自我紓解，失業者所面臨的情境至少有下列不容輕忽之處（摩擦性失業者不在此列）。第一，按照資本主義的法則，為了顧全企業之生存而遂行資遣及裁員，無疑是企業主的基本權利，但這所反映的乃是「企業本位」而非「人本位」的思維。辯護者固然會說，當企業無以生存時，則依附於企業的所有的人亦將無以生存。即使這樣的辯護有其一定的理據，但卻也反映了以企業為目的而以個人為工具的預設。這種目的和工具的倒置也意味著人的地位的被貶低，亦即在一定程度上職工係為滋養企業之生長而存在，當企業面臨生長瓶頸之際，部分職工即被視如負擔和累贅而遭棄置。第二，在資本主義底下，長期失業者雖仍生活在社會之中，但形同已經被摒棄於社會脈搏之外（亦即被摒棄於廣義的商品生產的循環之外），對這樣的人而言，不僅經濟上的自主獨立將是越來越遙遠的夢想，並使其逐漸陷入依賴狀態，更會使其產生嚴重的自信危機和生存意義的危機，而各國的統計數字都一再顯示了他們在輕生自殺者中都占有顯著的比例。似乎可以說，長期失業者就如同是資本主義版本的被開除教籍者（the excommunicated），他們只能旁觀社會的主流進程的展開，並在此一進程中被對比為一種「他者」（other），一種帶著污名記號的他者，而可歎的是，工資勞動者整體而言卻被迫陷入避免成為這種他者的相互搏戰之中。因此，失業既是經濟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更對相關者的精神面向有著極負面的影響。

面對失業者之處境，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當然不是毫無作為，它也推動了就業輔導、新的專長技術訓練、勞資人力需

求的媒合等等機制，此外，社會福利制度中的失業保險及救濟當然是主要的因應手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即曾指出，一大群產業後備軍（亦即失業勞工）的存在，使資本家更得以利用在職工資勞動者以及失業勞工彼此之間的矛盾，而同時對他們遂行掌控及專制（Marx, 1976: 790-794），而上述的失業救濟等等因應手段，可謂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在為資本家的牟利運動收拾善後。因此，我們先前所說的資本主義所隱含的企業本位，歸根究柢來說其實就是企業主本位或資本家本位，亦即，擁有生產資料者的生存權優先於未擁有生產資料者的生存權。但恩（John Dunn）曾坦率承認，現代資本主義是一個深知其本身的內在矛盾，但卻又意識到無法有效紓緩其內在矛盾的社會（Dunn, 1984: 69）。的確，資本主義在矛盾中存活，而抱持不同信念的人們也必須繼續在矛盾中尋求各自的改善之道。我們當然承認，社會福利制度中對失業者的援助，肯定是具有正面意義及進步性的，但我們更有興趣要進一步探討的是，在面對及處理失業問題時，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所反映的對於個人與群體之關係的理解。

當代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並未依循著諾吉克（Robert Nozick）、蘭德（Ayn Rand）等人所主張的完全仰賴市場機制的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的方向發展。市場機制除了有其正面的積極作用，亦產生了不容小覷的負面效果，最主要地，「如果市場的正常運作剝奪了某些自身並無過失的人的生存手段」（Moon, 1988: 29），則其正當性就面臨了問題。福利國家的出現以及政府對市場的一定程度的干預，皆是環繞著此一難題的後續發展。即使如此，受到一定範限的市場機制依舊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的核心構件。而仰賴市場機制來展開及組織經濟生

活，乃是假設了每一個人都是能夠進行選擇及判斷的行為主體，而每一個人皆在受到保障的自由空間裡竭盡所能地尋求他的個人利益，並且為自己的選擇及判斷所造成的結果來負責。此外，就自由主義來說，在自由主義所造就的秩序裡，每一個人都被認為是自由與權利的擁有者，而政府的主要任務就在於平等地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俾使每一個人能夠在這樣的保障之下，以他自己的方式追求他的人生計畫。自由主義的基礎無疑地就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基核是個人主義。...這項基核包含了將個人視為是最主要的，將個人視為是比人類社會及其制度和結構，要來得更為真實或更為根本的。這項基核同時也包含了賦予個人以一種比起社會或任何的集體都更高的道德價值。在這種思考方式底下，個人在各種意義上都先行於社會（Arblaster, 1984: 15）。」因此，個人主義或者對於個人的強調，乃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的基本出發點。

而在面對失業問題時，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所採取的失業救濟等因應方案，在意圖上來說乃是希望在儘量不減縮個人的獨立地位的情況下，讓社會起到協助弱勢個人的作用。這反映了社會有濟助弱勢個人的義務，社會應該對弱勢個人提供救生圈，同時，也進而要求非弱勢個人必須對其經濟自由進行一定的退讓。事實上，從人民之開始納稅就代表了經濟自由的退讓，就表明了絕對的經濟自由並不存在，而透過對非弱勢個人徵收較多的稅款以進行對弱勢個人的濟助，則更進一步擴大退讓的幅度。而這些退讓乃是集中在分配面向，亦即承認了政府得以在一定範圍裡介入經濟資源的重分配。瓦爾澤（Michael Walzer）曾主張，當前人類活動的興革重點應該是分配領域的社會化而非生產領域的社會化（Walzer, 1988: 25-26），這顯然正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所依循的方

向。我們要指出的是，在這樣的構圖裡，市場仍然是個人展開其生命活動的場域，個人仍然必須承擔其行動所具有的風險，群體或社會的作用則如同競技場邊的救援隊或醫護隊，專司賽場上傷患病號之照護，俟其康復則仍須回場競技。至於強勢競爭者（大資本）則仍被給予了極大之全力搏擊之自由，⁸ 甚至對弱勢者造成嚴重之傷害，但群體或社會大致只能靜觀其逞勇，並照護其逞勇後之傷員。

至於社會主義在面對失業問題時，除了必要的福利協助外，更重視充分就業的重要性，而和充分就業緊密相繫的就是工作權（right to work）。如密勒（David Miller）所強調的，社會主義要求在經濟面向引進新的權利（Miller, 1989: 72），在失業問題上，相關的新權利就是工作權，一種體現自己的存在意義並使自己不被排除於社會過程之外的權利。某位當代社會主義者這麼寫道：「充分就業是絕不能棄守的社會主義遺產的一部分，失業所造成的財政、心理和社會效應是如此具有破壞性，而充分就業的許諾對社會主義事業又是如此重要，因此，經濟民主（案：即該作者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模式）應毫不遲疑地保障每一個公民擁有真實的工作權（Schweickart, 1993: 111）。⁹」換言之，社會主義不贊同只是以因應緊急狀況的方式來面對失業問題（Gorz, 1994: 102），社會主義更著重的是失業狀態的解除，從而使失業者脫離福利收受者的地位並以積極的身分重新回返社會過程，故而工作權即意味著一種透過自己的勞動來確立自己之尊嚴的權利。但是，若干質疑者則認為，如果是透過政府分派不具生產性的工作給失業者來達成充分就業的目標，則對於那些藉此

8. 儘管反托辣斯法在各國間越來越形普遍，但這類法律迄今仍無法有效防範大資本對於市場和價格制定的壟斷。

9. 密力本（Ralph Miliband）亦謂，社會主義必須給予充分就業以極高的優先性，並使工作權得到普遍的落實（Miliband, 1994: 123）。

而得以就業者的自尊並無任何幫助(Elster, 1988: 77-78; Moon, 1988: 48)。這類的憂慮雖值得留意，但必須指出的是，充分就業的達成未必一定要仰賴非生產性職缺，再者，某些不具直接生產性的職缺（例如協助低收入戶子女的課業輔導、獨居老人之照護、社區安全之守護、電腦操作教學等等）依舊極富社會意義，從而仍足以給予從事該工作者以尊嚴感。要言之，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之承認及落實一定程度的福利權，即反映了社會主義思潮的牽引作用，而社會主義更進一步的工作權的訴求，在可預見的未來裡或許還可能產生另一波的牽引作用。

此外，相較於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之只著重分配領域的社會化，社會主義還關注生產領域的局部的社會化。事實上，一直都有證據顯示，倘若營運及管理得當，則公有企業或國營事業之績效未必就不如民營企業。再者，某些缺乏利基但卻關乎人民福祉之事（例如偏僻山區及鄉間的客運或火車路線等等），由於無利可圖而被民營業者棄如敝屣，這類業務即宜由公有企業以服務人民而非營利之考量承擔之。在資本主義利潤考量的準則之下，這一類的轉移很難被普遍貫徹；相反地，社會主義所強調的則是公益考量，在這樣的思維之下，缺乏利基但卻有其必要性的產業，才可能以社會的力量來加以維繫。雖然在極度崇尚市場機制的新式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長久影響下，生產領域的社會化一直遭到強力的抗拒，但在現今來說生產領域的社會化顯然已不再是一個不能碰觸的禁區。事實上，為因應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所採行的緊急紓困方案，最後若是由美國政府直接收購問題金融機構的股權，則美國政府本身就將成為美國國內最主要的金融力量之一。果若如此，則資本主義體制底下的生產領域不能被社會化的先入之見，也就不攻

自破了。因此，一方面守住市場機制，另一方面在必要及可行的範圍裡實施生產領域的局部的社會化，從而追求充分就業的實現（以及節制大企業對就業條件的壟斷），乃是社會主義思潮所提出的足堪省思之道。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曾指出，未限制個人自由的政府干預（他稱為非命令式的政府干預）是可以被合理化的，例如政府可以設立國營銀行及公營工廠，但並不壟斷銀行及製造業，而是容許民營相關產業繼續蓬勃發展，「當政府想辦法達到某一項目的，而又允許個人自由地採取他們認為更好的其他方法達到其目的時，自由便未受到侵犯，自由就沒有受到令人厭煩或使人墮落的限制（Mill, 1987: 944）。」這可謂很好地回答了可能的質疑。

綜上所論，從社會主義因應失業問題所顯現的構圖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更強調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成員身分（membership with positive meaning）。也就是說，個人當然必須盡己所能地為自己的人生計畫努力奮進，但在此一過程中，社會及群體將做為個人的更強力的支撐，一種著重守護個人的存在尊嚴的支撐。社會及群體除了目睹個人彼此之間的競爭，也關注弱勢者的處境，進而要以更實質的集體力量來防止個人被摒棄於社會過程之外。因此，社會將如同是一個關愛的母親，她始終格外關懷發展落後的子女。應該說資本主義更看重的是領先者的活動空間，而社會主義則顯然更關注落後者的處境的改善。相較於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賦予社會的做為競技場邊的救援隊或醫護隊的角色，社會主義對於社會或群體的期許顯然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進一步來說，失業問題乃是經濟不平等的一個表現面，而嚴重的、不人道的經濟不平等既反映了群體生活秩序的失調，亦暴露了看待個人與群體之關係的視角的不夠完善之處。而這也是政治理論在面對及思考經濟生活時最能貢獻

宏觀的興革意見之所在。

自由、平等、博愛，是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所標舉的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性的原則。回顧二百餘年來的歷史發展，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實踐確實極大地促成了自由的落實與確保，但在平等與博愛的體現上，則仍然路途迢遙。而在這條依然漫長的道路上，社會主義應該能給予更多的指引方向的光芒。如果只有在資本主義陷入周期性的經濟衰退時，才促使人們考量社會主義所啟示的手段的必要性，這固然也是一種應對的態度。而另一種態度則是，以更宏觀的格局將社會主義所啟示的手段鑲嵌到主流的體制之中，並長期地檢視其後續影響及其所可能產生的質變。我們認為，後一種態度才更能協助我們趨近平等與博愛的理想。

四、結語

做為當代政經結構的主軸，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對於人類群體生活的改善固然有其可貴的建樹，但其所顯現的內在難題亦應被嚴肅面對，尤其是那些放任經濟力量的無限制的展開所造成的難題。雖然我們不願落入極端的經濟決定論的窠臼，但仍然不得不說當代社會的許多政治困境可謂是源自於經濟原因，因此，除非從這些經濟原因著手，否則皆非釜底抽薪之計。做為本文的結論，我們有如下的考察心得。

- (一) 資本主義的局部社會主義化或許將是時勢之所趨。即使資本主義的核心構件依舊存在，但對於其遊戲規則逐步進行調整（更明確地說，進行接受社會主義的有益的啟發的調整），亦可能使其逐漸產生更具正面意義的質變。

- (二) 二十世紀的既存社會主義在政治上的不完備（例如缺乏可稱道的民主過程及對於個人自由與權利的保障），並不能做為否定社會主義的可貴理想的依據。社會主義的強項是對於經濟生活的批判和興革主張，保險性質的福利國家即可謂是社會主義影響下的產物（雖然其直接的思想淵源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格林、霍布豪斯等社會自由主義者），而共享性質的福利國家或範圍更大的分配領域的社會化，亦逐漸獲得更多的重視。若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回溯，即不難發覺社會主義思潮的長期牽引作用。
- (三) 資本主義本身的運作邏輯，尤其是其所造成的嚴重的經濟不平等，限制並壓抑了自由主義民主給予其公民的某些許諾，這也正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內部矛盾之所在。而對於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的質疑，正是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儘管不同流派的社會主義對此所提出的調解之道在程度上頗有差異，但它們共同反映的是，貧富兩極化的社會即意味著一部分的人無法有尊嚴及有意義地活著。而欲有效紓解貧富的兩極化及失業問題，就必須進一步考慮生產領域的局部社會化。
- (四) 完全揚棄市場的社會主義是缺乏說服力的，同樣地，完全仰賴市場機制的資本主義也將自陷泥淖。但市場可以有許多種不同的存在面貌，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經濟生活之主張上的交互交鋒，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更深入地釐清市場的作用與侷限、市場參與者的適用規範、市場與社會化的互補等等議題，乃是未來之要務。

(五) 在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上，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雖不樂於見到個人陷入淒苦無助的處境，但其強固的個人主義的預設終究使其有克制社會或群體之作用的傾向。相對地，社會主義則更傾向於開展社會或群體對於個人的積極協助的功能。然而，這樣的差異並非不可縫合。柏拉圖在《法律篇》第九卷曾謂：「並不是在所有的情境下一個邊界都直接和另一個邊界相連，有時候會有一個邊緣地帶先和兩個區域接壤，並成為這兩個區域的共同地域（中間地）。」（Plato, 1961: 1436）就當代的發展形勢來看，尋求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複合體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地的必要性，已越來越明顯。這種相互妥協也意味著從批評對方的缺點走向審慎評估對方的優點的必要性。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確實都曾以摧毀對方為其目標。但如果我們期望二十一世紀能成為一個更人道的時代，那麼，或許我們就必須承認，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意識型態能夠壟斷所有的最佳解答，並且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探尋跨界的修補與縫合的可能性。追求財富固然是正當的權利，但此種追求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亦不能被漠視。追求財富和避免貧窮（以及貧窮所隱含的存在尊嚴的剝奪）的平衡，應是改善人類經濟生活樣態必須著重的方向。

追求個人自由與權利的熱情，以及透過競爭營造更進步的環境的自然願望，在改善群體生活的歷史奮鬥中所蘊涵的正面價值是無庸置疑的。但人類社會畢竟還有做為一種合作體系的這個深層面向，合作鏈結的鬆動即是群體秩序失調的警示癥候，相反地，合作鏈結及合作意願的強化則是更良善的群體秩序之所繫。

參考書目

- Acton, Harry Burrows. 1993. *The Morals of Markets and Related Essay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 Arblaster, Anthony. 1984.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Liberalism*. Oxford: Blackwell.
- Baker, John. 1987. *Arguing for Equality*. London: Verso.
- Bobbio, Norberto. 1996. *Left and Right*. Cambridge: Polity.
- Crick, Bernard. 1987. *Socialis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unn, John. 1984. *The Politics of Soc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on. 1988. "Is There (or Should Be) a Right to Work?" in Amy Gutmann. ed.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53-7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Milton. 198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rz, Andre. 1982.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 Gorz, Andre. 1994.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London: Verso.
- Harrington, Michael. 1990. *Socialism: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Mentor.
- Heilbroner, Robert. 1985. *The Nature and Logic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orton.

- Hilferding, Rudolf. 1981. *Finance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Lucas, John Randolph. 1966.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aistre, Joseph de. 1994. *Considerations on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arl. 1975. *Early Writ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1976. *Capital: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1981. *Capital: Vol. 3*.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and F. Engels. 1967.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iliband, Ralph. 1994. *Socialism for a Sceptical Age*. Cambridge: Polity.
- Mill, John Stuart. 1987.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Fairfield, New Jersey: Augustus M. Kelly Publishers.
- Miller, David. 1989. "In What Sense Must Socialism Be Communitarian?" in Ellen Paul et al. eds. *Socialism*: 51-73. Oxford: Blackwell.
- Moon, J. Donald. 1988. "The Moral Basis of the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in Amy Gutmann. ed.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27-5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agel, Thomas. 1991.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wman, Michael. 2005.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ve, Alec. 1989. "The Role of Central Planning under Capitalism and Market Socialism." in Jon Elster and Karl O. Moene. eds.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98-1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Press.
- Nozick, Robert.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 Plato. 1961.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emer, John. 1994. *A Future fo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Schweickart, David. 1993. *Against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ruton, Roger. 1991. "Introduction: What is Conservatism?" in Roger Scruton. ed. *Conservative Texts: An Anthology*: 1-28. London: Macmillan.
- Sen, Amartya. 1996. "Social Commitment and Democracy." in Paul Barker. ed. *Living As Equals*: 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n, Amarty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Walzer, Michael. 1988. "Socializing the Welfare State." in Amy Gutmann. ed.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13-2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od, Ellen Meiksins. 1995.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John. ed. 2004. *The New York Times Almanac 2005*. Harmondsworth: Penguin.

Modern Implications of Socialism

Kuo-hsien Hsu *

Socialism first emerged as an antithesis of capitalism and gradually asserted itself as a grand thesis with moral contents and analytical power. Socialism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on based on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cooperative spirit, and that a more constructively equality can truly reflect freedom of the majority. Although already in decline in the 20th century, radical socialism can still serve as a reviewing framework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socialism and preserve and improve the best of capitalism and liberalism. This article will attempt to explore what socialism still has to offer through two perspectives: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the greater collective.

Key words: socialism, inequality, welfare state, unemployment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